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论

李何林 编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论

李何林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论

李何林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插页4 字数13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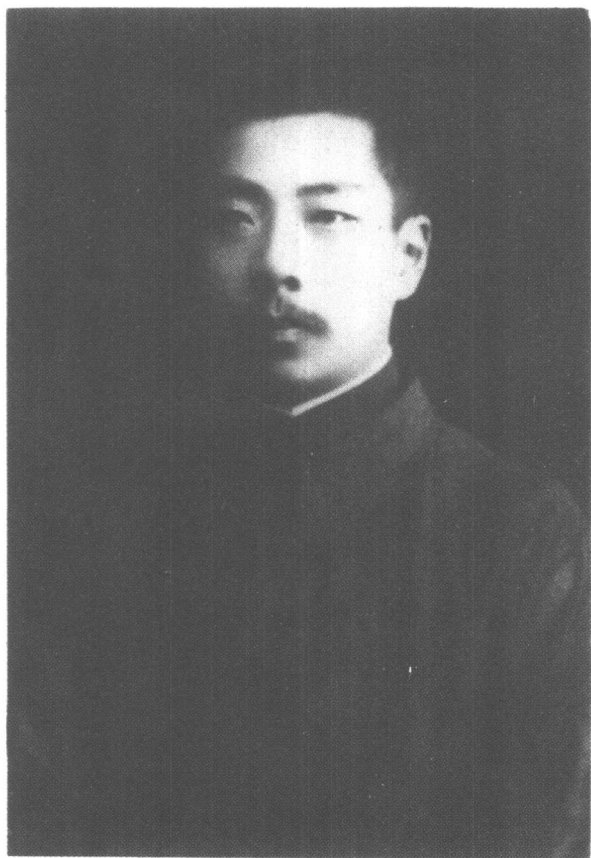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 10094·485 定价: 0.87元



鲁迅1903年在日本东京



鲁迅1912年在绍兴



鲁迅1926年画像（陶元庆 作）

目 次

一九八三年重印说明……………李何林 (1)

一九三〇年初版序……………李何林 (17)

读《呐喊》……………雁 冰 (茅盾) (19)

读《呐喊》……………Y 生 (24)

《呐喊》的评论……………成仿吾 (28)

“呐喊”……………冯文炳 (废名) (35)

鲁迅的《呐喊》……………玉 狼 (37)

呐喊……………天 用 (40)

鲁迅先生……………张定璜 (45)

我所见于《示众》者……………孙福熙 (56)

鲁迅先生……………尚 钺 (61)

致志摩……………陈 源 (陈西滢) (64)

鲁迅先生……………锦 明 (黎锦明) (70)

鲁迅的《彷徨》……………任 叔 (王任叔) (73)

呐喊……………西 谛 (郑振铎) (80)

附：《阿Q正传》的成因……………鲁 迅 (82)

第三样时代的创造——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

……………一 声 (刘一声) (89)

鲁迅先生往哪里躲……………宋云彬 (92)

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景 宋 (许广平) (96)

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R. M. Bartlett (98)
石 孚 译

鲁迅论.....方 壁 (茅 盾) (101)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邨 (131)

革命与知识阶级.....画 室 (冯雪峰) (160)

鲁迅.....林玉堂(林语堂)作
光 落 译 (166)

阿Q时代没有死.....青 见 (172)

鲁迅 (又题《论鲁迅》)钱杏邨 (174)

附录:

鲁迅先生撰译书目 (止1926年6月) (183)

鲁迅自叙传略..... (187)

一九八三年重印说明

(本书内容简介)

李 何 林

这是五十三年前编辑出版的一本书，编书时的情况或经过，我已在《中国文艺论战》一书的《重印说明》中讲了；简单地说，就是从1928年夏到1929年春在北平未名出版部避难时我编完了《中国文艺论战》，接着我又编完了这本书。

这本书收进了从1923年秋到1930年春大约七年多时间内评论鲁迅作品和其思想作风的文章，长短共二十三篇，书末附印了《鲁迅先生撰译书目》和《鲁迅自叙传略》，供读者参考。在西谛（郑振铎）的评介《呐喊》一文的后面印了鲁迅的答复：

《(阿Q正传)的成因》。此外再未选印鲁迅当时回答这二十三篇中对他歪曲诬蔑以至谩骂的文章，现在也没有必要再加进去；读者可以参看《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而已集》、《三闲集》和《二心集》中的有关杂文。因此这本《鲁迅论》也为阅读这六本杂文集集中的有关文章提供了某些论敌和论据；也可看见有些人当时对《呐喊》、《彷徨》、《野草》和《故事新编》的《不周山》是怎样的看法。这就涉及到对鲁迅从1918年开始发表的《狂人日记》等作品和到1929年的杂文的评论，也就是对鲁迅“前期”十年多的著作和思想的评论。当时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究竟是怎样的水平？文艺界又是怎样的情

况呢？我们就从对鲁迅的这些评论中来看一看吧。

这二十三篇评论，多半评论了《呐喊》，少数涉及到《彷徨》、《野草》和杂文；自然也有涉及面比较广的，如茅盾（雁冰、方璧）、张定璜、林玉堂（林语堂）、钱杏邨等。这二十三篇有十三篇发表在1927年以前，十篇发表在1927——1930年之间。1927年以前，即1923年到1926年，在文艺思想界，是由“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为社会而艺术”和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论争时期转向文艺“为革命”的时期。鲁迅是主张文艺为人生为社会，反对“为艺术”的，这就遭到了创造社的非难。

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呐喊》出版后不久，紧接着雁冰的《读〈呐喊〉》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文学周报》上发表之后，就在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季刊》上发表了《〈呐喊〉的评论》。他首先说他听到了文坛上“一声宏亮的呐喊”，“却有点觉得嘈杂而可厌”；是“赞”呢，还是“贬”呢？他都觉得很为难。所以他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这呐喊的雄声，不是值得灵魂去试一冒险？”他于是写了这篇论评。他认为《呐喊》的十五篇（当时《不周山》还未删去），“前九篇是‘再现的’，后六篇是‘表现的’”。“再现”辛亥革命时代的生活，不如“表现”近来的生活好。“再现”，只是“记述”，只是“筑成”“这世界住民的典型”，“这一个个的典型筑成了，而他们所住居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作者的失败也便在此处”。这就是说作品塑造的典型不好。

他又说“这前期的几篇，可以概括为自然主义的作品”，“《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

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他认为“作者描写的手腕高妙，然而文艺的标语到底是‘表现’而不是‘描写’，描写终不过是文学家的末技。而且我认为作者只顾发挥描写的手腕，正是他失败的地方。”他肯定《端午节》，贬低《阿Q正传》。并且说“《端午节》的表现的方法恰与我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他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端午节》之所以好，原来是因为“表现自我的方法”和创造社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

《白光》则很象郁达夫的《银灰色之死》，“可惜表现又实在不足，薄弱得很”。不如郁达夫。《兔和猫》与《社戏》只是“饶有诗趣”。《鸭的喜剧》“实不能说是小说，倒是一篇优美的随笔”。成老特别称赞了《不周山》，说它“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作者由这一篇可谓表示了他平生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这种有意识的转变，是我为作者最欣喜的一件事。这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总是全集中第一篇述作。”这就是说：鲁迅写《不周山》已表示他由原来“拘守着”的为人生为社会的“写实的门户”，“进入”到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艺的宫庭”了，和创造社曾经有过的艺术没有任何为社会为人生的目的，目的只在表现美的所谓“纯文艺”思想靠拢了，因此成老说鲁迅“这种有意识的转变，是我为作者最欣喜的一件事”。

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说：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

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有仍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下“庸俗”在跋扈了。

以后《不周山》改为《补天》，收在1936年初出版的《故事新编》里。

在1927年以前，鲁迅在北京时期，除了遭到以成老为代表的创造社的几乎全盘否定以外，《现代评论》派的陈源（西滢）对于鲁迅的歪曲和诬蔑，则是比较突出的有代表性的另一方面。西滢的“闲话”有不少是攻击鲁迅的，鲁迅1925年的《华盖集》和1926年《华盖集续编》中反驳西滢的杂文也很多。这是一次有代表性的思想斗争。瞿秋白在1933年说：“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章士钊’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他主人更严厉的狗’，……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卑劣、懦弱、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争之中不可少的阵线。”（《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里只收了陈源（西滢）1926年1月30日发表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的《致志摩》的一封信。当时这封信发表后，鲁迅立即在2月8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了《不是信》（见《华盖集续编》），对陈源的歪曲、诬蔑和攻击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反驳。读者把《致志摩》和《不是信》对照着看，就可以看出究竟谁是“放冷箭”，“捏造事实”和“歪曲诬蔑”。我这里就不对鲁迅反驳的内容作具体介绍了。但对《致志摩》中提到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李仲揆）和章士钊的地方，倒要说明一下：因为到五十多年后的1980年还有说鲁迅当时批评李四光和章士钊都是错误的，因为李四光的地质学对新中国的地下资源的开发贡献很大；章士钊晚年也替新中国作了些好事；他们都是好人，鲁迅先生批评好人，可见错了。要知道鲁迅当时批评之所以涉及到李四光，是因为他和《现代评论》派站在一起，陈源也为他辩护，并借以攻击鲁迅，鲁迅并没有否定李四光的地质学，读者可参看《华盖集续编》第一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的第二部分驳陈源的《做学问的工具》。鲁迅说“北京国立图书馆”每年经费只有三万元，每月二千余元，而正副馆长梁启超、李四光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还有多少钱可以买书呢？“做学问的工具”也就难办了。陈源在《致志摩》里对此为李四光每月薪水五百元辩护，说李只拿二百五十元，那一半，“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鲁迅则说李拿的250元，是每月稳可拿到的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其余250元则是北洋军阀政府要拖欠几年才能补发的欠薪。毫未涉及李四光的其他方面，更未否定他的地质学。

鲁迅批评的章士钊，不是晚年的章士钊，也没有说他一辈子不能做点好事。他批评的是1924——1926年的担任北洋军

阅政府的教育总长、司法总长以至秘书长的章士钊；鲁迅批评他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白话文，提倡尊孔读经（下令中小学读经），批评他支持反动校长杨荫榆镇压进步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那末，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鲁迅批评错了呢？

本书选的1927年以前评论鲁迅的十三篇文章中，除了以成老为代表的创造社和以陈源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否定鲁迅以外，其余十一篇基本上都是肯定鲁迅的。每个人（雁冰、Y生、冯文炳、玉狼、天用、张定璜、孙福熙、尚钺、锦明、任叔、西谛）都谈了他们对鲁迅在1918——1926年间发表的作品的心得、认识和评价，都还可以供现在的读者参考；有许多是我们现在不可能体会的，自然也有很多不如我们现在的体会和认识。因为从他们的这些评论中还很少看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而我们现在的鲁迅研究界已经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哺育几十年了，尤其是全国解放后的三十多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太方便了，我们应该比他们的体会深广些，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在很多方面做到了。请大家比比看：单从“鲁迅研究”这一领域看，我国的文艺理论思想、批评的水平，比五十多年前是大大提高了。而这提高的主要原因我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学习。最近有人在杭州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说：不应该强调鲁迅前期（习惯指1918——1927）的作品之所以深刻，主要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主要”是受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的影响么？他何以与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不同，与李大钊和当时的陈独秀思想接近呢？否定鲁迅后期（1928——1936）作品之所以更加光辉灿烂，“主要”是由于在革命斗争需要中更加认真地大量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也是不符合鲁迅实际的。我不否认鲁迅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水平，但外界的思想理论的影响对任何人都起很大的作用；受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斗争实践是会不同的。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思想教育呢？地主资产阶级也一直在运用各种形式、各种工具在进行他们的思想教育。这道理是很浅显的。我们过去说“二三十年代的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主要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现在也不敢说了吗？

以下再看看1927——1930年间对鲁迅的十篇评论。

1927年1月18日，鲁迅由厦门到达广州，应中山大学的聘请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在2月21日出版的《少年先锋》

（共青团广东区委员会的刊物）2卷15期发表了一声2月14日写的《第三样时代的创造——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原印为《第三样世界的创造》，该刊18期的《编辑室通信》即把“世界”改正为“时代”；这是据鲁迅1925年写的《灯下漫笔》中“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一声文章的意思也是“时代”，不是“世界”。我现已代为改正，和1930年的《鲁迅论》的篇名不同）。按一声即刘一声，当时在广东团区委宣传部工作；经广州党委研究委托他写过这篇文章，可以说代表党团欢迎鲁迅来广州创造第三样时代。一声的这篇文章和以上十三篇比，有一些新的内容：他“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评论鲁迅，就是把鲁迅所“努力”的“思想革命”工作摆在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上来评价。说“除了以推翻整个的旧制度为专业的共产主义者而外，在中国的思想界中，象鲁迅一般的坚决彻底反抗封建文化的理论，是很少的。因此，他比资产阶级思想更进了一步，因为资产阶级之反抗封建文化，向来是不彻底，带有妥协色彩的。”这就

有了阶级观点的比较。他说：“他这种革命的思想，再用他的天才的文学手腕表现出来，效力自然更加广大。他对于敌人的攻击，每一击都有力，中了要害，使敌人受伤。”“他不但在卢骚、孟德斯鸠之后，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之后；不但在法国革命之后，并且在俄国革命之后。在这个新时代的巨潮中，他自然是受着震荡的。”就是说他是在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最后，他号召两广的青年要“有决心和勇气去负起创造”第三样时代的使命。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篇文章的有些看法不免有不够全面和妥贴的地方，但基本上有一些新的观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因素。

鲁迅到广州以后，“居然硬干起光杆的中大教务主任来了——教员还未全备，开课就在目前”；还有，“整天的谈话，鲁迅先生躲在这里什么也做不出来了”（见景宋的《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教学行政工作缠身，使鲁迅暂时不可能发表文章和对群众讲演；于是引起了宋云彬在2月的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发表了《鲁迅先生往哪里躲？》据说景宋（许广平）根据鲁迅的意思，在同月的《新时代》副刊上发表了《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作为答复：鲁迅暂时躲到教务中去了，但是，“他是要寻找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血痕的。等着有终究到来的机会，……他于是有文章可作了！”题目虽然都不象评论鲁迅，但文中有不少评论鲁迅的话：宋云彬说《狂人日记》给中国文学“划一个新时代”。“过去的鲁迅，站在最大的改变时代的社会里，把旧社会死灭的苦痛深刻地写出来。”“匆匆的六七年来，鲁迅的作品已得到一个相当的地位，我当自诩见解没有错。”因此，他惟恐鲁迅“跳出现社会去作旁观者”，“莫尽自

在大学教授室里编你的讲义”。“只希望你不愿作旁观者，继续呐喊，喊破了沉寂的广州青年界的空气。这也许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哪里躲？”在热情的期望之中，也包含着较高地评价鲁迅的意思。当时中山大学的文科教授学者不少，为什么青年们不对他们提出“往哪里躲”的问题呢？

在一声、宋云彬、景宋三篇外，1927—1930年间评鲁迅的文章中有两篇是译文；即：石孚译的《新中国思想界的领袖》和光落译的林玉堂写的《鲁迅》。前者是作者在1926年夏天会见鲁迅以后写的，发表在1927年10月号的美《现代历史》上，译文载《当代》1卷1编。作者除引了一些在会见时鲁迅的话（不一定准确）以外，说1918年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短篇小说的开始”。说鲁迅“极富于同情心和热烈的情绪”。说“法国文学大家罗曼罗兰氏读完了《阿Q正传》后曾说‘这一篇写实作品，里面很多讥讽言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阿Q那副忧愁的面孔’”。中国读者得知罗曼罗兰评价《阿Q正传》的话，是由于这篇文章比较早的介绍吧？（据法文译者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从法国寄鲁迅的信中说：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话是“《阿Q正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的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何林注）说“鲁迅用写实方法描写一个农民阿Q的思想，把阿Q那种的情景，绘得淋漓尽致。阿Q不识革命为何物，不解新时代的意义，都历历地说了出来。”他还评了《风波》和《狂人日记》。说鲁迅“是一个天生的急进派，无所惧的批评家和讽刺家；有独立的精神，并且是民主化的。”“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敌人，笃信科学，鼓吹新思想”。